

社会史



近代绅士

王先明 著

一个封建阶层的
历史命运



绅士，一个不是官僚，却曾一呼百应、左右一方的群体，其兴也迅，其逝也速。时势耶？抑或他故？

天津人民出版社
TIANJINRENMINCHUBANSHE

D691.7

0103073

2

近代绅士

一个封建阶层的
历史命运

近代绅士

——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王先明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宝坻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850×1158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插图 264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01-02224-5

K·287 定价:16.80元

前 言

历史永远是一个民族获取理性力量的巨大的认识对象。尽管当前史学在学科发展的泥淖中苦苦挣扎的窘境令人沮丧；尽管史学论著（绝大多数）并不拥有真正的社会读者，而只是在狭小的学术圈子里打转；但有一个事实却不容怀疑：即一个民族对于未来方向选择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于自身历史认识与反省的深度。

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快速节奏中，人们对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寄予过分的期望，企求从中获得直接的利益和可以兑现的价值，包括物质的、精神方面的满足，但严谨的史学著作却注定不能也不会适合“小市民”般的口味，因为它最终排斥那些纯粹的“功利性”作品。

人们可以在“功利”面前冷落历史，甚至忘却历史；但历史本身所具有的必然性力量却无情地制约着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和惯性都将超越一切人的主观愿望和“功利心”而顽强执著地指向未来。

物质的富有者善于在现实的追波逐流中攫取财富，而精神的富有者却乐于在深沉的历史潜流中洞悉未来的行程。前者可能属于个人与社会，后者却属于人类与未来。因而，越是在社会历史的转轨时代，越是在史学发生“危机”的年代，我们越有理由坚信：

史学是属于思想者的领地；

历史是登上未来高地的基点。

近代中国社会历史之于中华民族悠久而辉煌的五千年文明，实不过一瞬。但作为改变了民族历史进程的这一短促的时代，却不会因其只有近百年的时光而稍减其丰厚的历史内涵——世界历史范畴内的中西文化碰撞，新旧时代的蜕变嬗替，理性与情绪的冲突与交织，心理与行为的对立与趋同，社会结构与功能的错落与整合……这一切极具有历史认识价值的信息都密集地聚结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这仍然是一个过于巨大的难以一时全面把握的认识对象，尤其对于我们青年学人来说。于是，我们需要选取一个切口，由此切入历史深层，窥视那不易被人探觅到的历史奥秘。

历史真理的揭示，依赖于对具体社会生活的探求。

绅士阶层的形成及其存在，很难说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中一个最显著的历史特色。而绅士阶层在近代由封闭型流动发展为开放型流动，并由此怀着功名身分失落的心悸和欣慰，分途流向其他社会阶层，最终由分化走向消亡，毋宁说又是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功能易变中的一个时代特色。在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及其社会阶级关系体系的变动过程中，无论是新生阶级力量的形成和发展，还是旧存阶级力量的分化和消亡，都与绅士阶层的历史性变动密切相关。

因此，由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动去探寻绅士阶层演变的历程，从绅士阶层的历史轨迹去把握近代社会结构变动的进程，就成为作者探讨这一课题的基本视角。

目 录

01-107/09

前 言	(1)
-----	-----

第一章 千年流变

——绅士阶层的历史考察	(1)
一、身分的起源	(1)
二、绅士的构成	(5)
三、绅士的属性	(12)
四、历史的演变	(19)
五、近代的发展	(24)

第二章 乡土权威

——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	(33)
一、社会结构中的绅士	(33)
二、“四民之首”	(41)
三、官民“中介”	(50)
四、权力的延伸	(59)
五、农耕社会的基本需求	(66)

第三章 从保甲到团练

——基层社会控制与绅士阶层	(73)
一、保甲与绅士	(74)
二、宗族与乡社	(82)
三、团练与绅士	(93)
四、控制的主体	(101)

第四章 千古变局

——旧阶层与新时代·····	(108)
一、“华夷”冲突·····	(108)
二、绅士与传教士·····	(116)
三、变局与抉择·····	(129)
四、社会变迁·····	(137)

第五章 社会流动

——近代绅士阶层的动态分析·····	(146)
一、封闭型流动·····	(147)
二、开放型流动·····	(158)
三、绅士的多向流动·····	(166)
四、历史影响·····	(176)

第六章 结构错动

——近代社会结构演变的历史走向·····	(183)
一、错动趋向·····	(184)
二、“商”的地位·····	(193)
三、“士”的作用·····	(201)
四、等级结构的分解·····	(205)

第七章 风动潮涌

——收回利权运动与“绅商”力量的崛起·····	(211)
一、绅士与路矿风潮·····	(212)
二、抗争的时代内容·····	(220)
三、“亡清之起点”·····	(229)
四、“绅商”的时代特征·····	(235)

第八章 承旧启新

——近代社会结构转型中的绅士·····	(244)
一、“转型”过程·····	(245)
二、绅士与社团·····	(256)

三、时代“中介”	(267)
四、“异质同体”	(276)
第九章 迷离的“绅权”	
——早期民权的历史内涵	(286)
一、“绅权”的发端	(287)
二、“绅权”的扩展	(295)
三、“绅权”与“民权”	(305)
第十章 走向消亡	
——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	(316)
一、分化与消亡	(317)
二、分化的原因	(323)
三、历史作用	(330)
四、历史的缺憾	(340)
后 记：告别“昨天”	(347)

第一章 千年流变

——绅士阶层的历史考察

近代中国社会在历史的存续和时代的变迁中所拥有的丰厚的理性内涵和复杂的内容，都不是一些简单的定性概念和原则所能包容，如果我们长久地被程式化的定性教条所束缚，而不能深入到近代社会生活的深层，那将最终丧失一个历史学家应有的良知和责任。

一旦我们真诚地投入与我们并不太遥远的近代社会历史的探索中，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事实与我们意识中固有的框架常常很难契合：在近代社会结构“千古变局”的激烈易动中，一个通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社会集团——绅士阶层，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却是社会地位最为重要、变动也最为剧烈的社会力量。

历史是以事实为基石的哲学。

让我们依循着客观的历史进程，借助于史实的力量去展示近代绅士阶层的历史特色。

一、身分的起源

绅士一词或称士绅，亦称绅衿，在近代社会中是同一个社会存在对象的不同称谓。在叶镇的《作吏要言》中，绅士与绅衿是彼此不分相互交替使用的完全一致的概念：“为官不接见绅衿，甚

属偏见。地方利弊，生民休戚，非咨访绅士不能周知。”^①但是，悠长的历史过程所赋予“绅士”的近代内含，相对湮没了它原本的意义。追溯历史渊源，我们不难发现，绅、士、衿原本含义不同，指称有别：“古之仕者，垂绅插笏。”^②绅，指绅带，是古代士大夫束在衣外的大带。《周礼·典瑞》称：“王晋大圭”。晋者缙也，谓插于绅带之间。“疏曰：汉有缙绅之士，亦为插笏于绅。”^③绅的引申含义为“束绅之士”，是指以“绅带”为标志的具有特定身分的人。所以清代学人梁章钜认为，绅士是“缙绅之士者，缙笏而垂绅带也”。^④

士是含义极为宽泛、起源甚为久远的概念。《诗经·甫田》有“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之句。其中髦者，俊也；俊士指“秀民也”。古者士出于农，而工商不与焉。管仲所谓“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愿，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⑤事实上，古代之“士”既可指居官与有职位的人，也可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⑥

衿，指青衿，是古代衣服的交领。“青青子衿”，“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⑦青衿作为学子特定的服饰，成为以后科举中秀才（生员）的固定服饰，并且随着漫长的社会历史的演进，如同“绅带”一般，“衿”也由原初的“衣饰”变易为一种特定社会集团的代称。

在“定贵贱、明等威”的封建社会结构中，在复杂的层累的社会

① 《牧令书》卷7，取善

② 《辞源·缙绅》。

③ 翟灏：《通俗编》卷5，仕进。

④ 梁章钜：《称谓录》卷25，绅士。

⑤ 《管子·小匡》。

⑥ 刘泽华：《战国时期的“士”》，《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⑦ 《十三经注疏》卷4。

会关系体系中,既然人们的社会地位被区分为严格的等级,人们具有贵贱尊卑的各种身分,那末,用以标识这种等级或身分的服饰也就迥然不同。特定的服饰不管是特定的社会等级集团的一种识别,“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1]如明末:

“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纁纱绫绢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

“总非士林,莫敢服矣。”^[2]

不同的服饰体现着不同的身分和等级,至于人类远祖发明的服饰本身的物质功用和美学价值却在封建等级的形成历史中,被人类创造的另一层次的“文明”的亮光所遮没。对于清代官僚所服用的“补服”、“顶戴”以及朝珠、腰带、花翎之类,其质料、花纹、图案所体现的等级、身分、品位就更为鲜明和严格了。

无论“绅”还是“衿”,最初都是明示等级、标识身分的一种服饰。作为这一概念的引申,它发展为特指有一定地位和身分的人——士、士大夫。但是,“乡宦之家居者为缙绅”^[3]之绅,是指退职家居的官僚,而士或士大夫则是指任官的读书人而言。“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进贤达能谓之大夫也”。^[4]《汉书》中说:“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5]在古代,“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人们通常认为“起来执行政务的是士大夫”。^[6]因此,缙绅与士大夫曾经是含义近似的称谓概念。

1. 叶梦殊:《阅世编》第173页。

2. 同上。

3. 叶梦殊:《阅世编》第171页。

4. 《百子全书》,《白虎通·爵》卷1。

5. 《汉书·食货志》上。

6. 林尹:《周礼今注译》第419页。

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使拥有身分也拥有知识和地位的“士”,获得了一种具有广泛性和相对平等性的制度化保障。尽管“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得在歧路上摇摆了一千余年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与封建专制政治彻底合流”,^①但是,借助于科举这一制度化流动渠道,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在全力以赴创造着愈来愈多的“功名”之士和身分之士。等级、身分作为封建时代人们社会关系体系中特定地位的标识,它所拥有的社会价值分量与其数量的增长注定成为反比关系:其人数愈多,其价值愈轻。恒定的社会历史规律的内在作用,从来都是在人类并不自觉的活动和盲目追求的现象背后,发挥着不可抗拒的力量。明清之际,依循着科举途径,“士子”谋取功名者不断增多,遂使“功名”身分之士与国家官僚职位所能容纳的差距拉大。即使“功名”在身,也很难人皆入“仕”。《客座偶谈》所言并非虚语:

“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消纳十不得一。”^②

如此,士才超越了古代“学以居位曰士”的内涵,而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性意义。于是,绅与士才各有所指称的不同对象。在明末清初之际,绅还保留着“缙绅之士”的历史遗痕而与纯粹的“功名”之士的“士”有所区别:

“今则缙绅,举贡概用肩舆,士子暑不张盖,雨则自擎。在贫儒可免仆从之费,较昔似便,然而体统则荡然矣。”^③

① 任爽:《科举制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②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2。

③ 叶梦殊:《阅世编》第86页。

叶梦殊在记述清顺治中期的礼乐仪节时说：

“缙绅大老之丧，不但有行状，且有行述行略之刻。……其后凡属缙绅皆用，今则士流也效之。恐日后滥觞，流及市井舆隶之温饱者，从风而靡耳。”^①

因而，言绅称士显有区别。

然而，历史是既具有累积继承也具有扬弃变异的动态发展过程。正像大不列颠政治土壤上孕生的“绅士”一词并不是披坚执锐的骑士和罗马时代的斯多噶哲人的称谓^②一样，中国社会中晚近时代的“绅士”一词，也逐渐远离了它所拥有的原生形态的含义。当然，即使如此，近代时期的“绅士”的含义也不能完全摆脱它初始生发的内在要素的制约。

不过，历史却隐约地衬托在它的背后。

二、绅士的构成

不断地在发展中完善自身，同时也改变自身，这大约是社会运行的无可置疑的规则。尽管人类有着追怀往事的天性和详尽记述历史的辛勤，但在发展了的现实中（即便是同一社会事物在同一性质社会中的自然延续），也难以完全再现它原初的形态、特征和意义。

称谓概念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尤其是那些昭示尊贵身分的概念。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称谓概念

① 叶梦殊：《阅世编》第39页。

② [英]丽月塔：《绅士道与武士道——日英比较文化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4页。

本身及其指属范围,都会相应地改变。明清时期,绅与士由原本各有所指的含义,发展为一个整体的概念,表现出“绅士”合指的趋向。叶梦殊《阅世编》“冠服”中就将职官和举贡生员概称为绅士。该书在记述1660年(顺治十七年)苏松黜革绅衿一万三千余人案时,把曾出仕者称为乡绅,未出仕者称为士、衿;合而言之,则统称绅衿。^①在此,绅衿即绅士其涵义是完全相同的。在近代时期,绅士或绅衿的这一涵义已具有社会普遍认同的意义了,如《申报》刊文称:“世之有绅衿也,固身为一乡之望,而百姓所宜矜式,所赖保护者也。”^②因而,这里的绅衿同“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③的绅士是完全同一的。

在近代社会中,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社会法律所认可的身分、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④因而,“官退为绅,绅出为官,初非异致”。^⑤

绅士成为一个整体化的称谓概念,是这一社会集团本身发展到近代已具有了相对稳定状态和内部聚合力的社会存在的反映。

首先,清中叶以后直至近代,获得“功名”、“身分”的士子数量增长较快,而封建官僚的基本职数却大体保持稳定的常态。官僚后备队伍的基数大大超过官僚队伍本身,二者之间的差距造成“功名”之士的不断“沉积”。尤其在“十九世纪社会中取得成就的合法道路上的这些滞碍,即教育和文官制度中的问题,促使人们诉诸非法途径,从而提高了非法途径的重要性,特别在富裕和有权势的人们中更是如此。……从而扩大了候补官员的队伍,他

① 叶梦殊:《阅世编》第110页。

② 同治壬申(1872年)5月1日《申报》。

③ 徐世昌:《将吏法言》卷5,第8页。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217页。

⑤ 同治壬申(1872年)5月1日《申报》。

们麇集在水陆交通等候着不可能兑现的任命”。^①如此,同大体保持常量的官僚相比,全国数万举贡、数十万生员,^②就只能望仕兴叹以“顶戴荣身而已”。^③他们逐步沉积下来,成为比较稳定的社会集团力量。

其次,清代“独奈何进身之始,科甲、保举、捐纳既已不一途”,^④遂使社会集团间的流动加强,形成“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缙绅”^⑤的颇令“正途”绅士心寒意冷的局面。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兴起对清政府财政压力的加大,导致王朝充分利用捐纳制度以支撑日渐枯竭的财政。由此,清王朝“创造一个起平衡作用的绅士集团的最终目的不复存在”。^⑥在钱财与人才的双重匮乏的压力下,缺乏政治远见的国家权力中枢,只能舍远求近地从“功利”目的出发选择“财源”而不顾及人才制度的终极目标。这似乎是任何一个并不高明的统治政权所具有的共同品格。结果,从19世纪上半叶至下半叶,由捐纳而列位绅士集团的人数迅速增加,其增长率为50%。^⑦据计,在太平天国前捐官人数约为3.5万人,而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捐官人数骤增至53.4万人。^⑧许多人通过“异途”跻身于绅士集团,因而“光绪中叶以后,捐例迭次减成,有余资而慕虚荣者争辇金纳之。于是,戴翎顶膺封赠,门列衔牌,出备舆从,俨然宦家气象,名器之滥至斯为极”。^⑨“功名”“身分”既作为封建时代个人政治生命历程中永恒

①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第120—121页。

② 《政务处奏酌拟举贡生员出路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

③ 《论秀才轻重》,光绪癸未(1883年)10月18日《申报》。

④ 《郑观应集》上,第352页。

⑤ 《郑观应集》上,第563页。

⑥ 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⑦ 同上。

⑧ 孙立平:《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努力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3期。

⑨ 《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志,第868—869页。

矗立的界碑，也作为封建王朝政治生命赖以安稳的基石，曾经有过荣盛昌明的岁月；但面对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社会的法则有时也真如自然的法则一般：一旦一座山岳耸立出平原，那么，削弱其高度的腐蚀作用同时也就开始了。清王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末世王朝，在它的晚期，终于以“卖官鬻爵，那怜十年寒窗”^①的气魄，执行着削弱“功名”“身分”制度的不自觉的法则。

迅速增长着的功名、身分之士，事实上就是“功名”“身分”贬值的一个社会标尺。大量的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功名”“身分”者，由于官职的相对减少（官僚后备力量与官职之间本是反比关系），而不断地沉积下来，同时又因其特殊的“身分”地位而不屑从业，遂凭藉“名器”顶戴成为超乎平民以上的特殊社会力量。尽管他们出身途径不同，功名身分有别，却都具有区别于平民的“身分”，而这正是他们之间的“同一性”。这个为封建国家机器同时也为封建社会所认可的“同一性”决定了他们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独特地位，使这一社会集团具有了相对的内聚力。绅士，也就成为有所固定指称对象的整体化的称谓概念。近代社会常将“绅界”与官界、学界、商界并称，把它划分为最基本的社会集团。在清末户口统计项目中，绅士也是同官、农、工、商并存的一项。^②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绅士比之于其它社会群体，其内部构成则更为复杂一些。检阅近代官私文献资料，我们发现所谓绅士者，大约有下列几类成分：

（一）具有生员以上的科举功名者。通过科举获得功名身分，是封建政治跨入成熟期的制度化社会流动的主要形式。虽苦贫寒士，一经科举与试，取得功名，便护身有符，成为高于平民之上

① 洪仁玕：《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史料》第146页。

② 《清末的北京人口》，见1986年8月21日《文摘报》。

的特权分子。“是以一游黉序，即为地方官长所敬礼，乡党绅士所钦重，即平民且不敢抗衡，厮役隶人无论已”。^①即使是秀才（生员）身分，也足以跻身于绅士集团。“大抵为秀才者，区区小功名足以自异于人，而人亦以其秀才而相与异之”。^②在近代绅士集团中，从其数量和地区分布来看，生员是其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因而，通过科举途径获得举贡生员以上功名者，就自然成为绅士中的一分子。在清末民政部户口统计说明中和近代学堂“绅班”招生章程中，都明确“举贡生员”为“绅士”。^③

（二）由捐纳而获得“身分”者。晚清捐纳大开，由此而晋身者大有人在。郑观应辛辣地讽喻道：

“天下自捐纳之开，朝廷之上几有市道焉。……从此守财之虏，纨绔之子，只须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部，立可致荣显。”^④

为了获得封建等级身分，在朝廷标价售爵的鼓励下，富商地主无不争相捐资纳爵。在近代官场上，捐纳名目可谓奇绝：

1. 有集体集资捐纳者，“则聚数人之资而捐一官，夤缘得缺，上夺下剥，换次递捐，不数年，则会中人皆俨列缙绅矣”。^⑤

2. 有“仆从带肚者”，因捐纳者资金不足，“则择仆人之有钱者向之借贷，……一得差缺”，必将“司门签及钱漕肥美之役，予之仆从”。^⑥因而，近代绅士集团中过多地渗入了铜臭的因素，

① 叶梦殊：《阅世编》卷4，第83页。

② 《论秀才轻重》，光绪癸未（1883年）10月18日《申报》。

③ 见《大清宣统新法令》第2册，第5页；《锡良遗稿》第1册，第649页。

④ 《郑观应集》上，第563页。

⑤ 光绪壬午（1882年）7月2日《申报》。

⑥ 1882年7月2日《申报》。